



新型网暴“开盒”：警惕“数字时代的游街”

豹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想

“抓黑话”，是李晓涵每天的日常。当她努力辨认“开盒者”的暗语时，屏幕背后的对手，也在不断变换“马甲”。

“从‘无偿帮开盒’到‘无偿’，再到简单的一个‘开’字，为躲避平台监管，他们的行话越来越隐晦。”抖音平台网暴治理负责人李晓涵在做客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说》栏目时说，这些暗语涉及被称为“开盒”的新型网络暴力行为。

她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数字时代的游街。”“开盒”者从琐碎的信息入手，像解锁盒子一样，层层扒出受害者的真实身份、住址、亲属关系等隐私，再煽动他人进行线上辱骂、线下骚扰。

一条黑色产业链，信息是如何泄露的

面对“开盒”乱象，今年，中央网信办两次印发通知，明确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开盒”行为。

“‘开盒’虽然是新词，实则是‘人肉搜索’的升级版。过去‘人肉搜索’可能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现在‘开盒’已经发展成了一条成熟的黑色产业链，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下单。”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副庭长逄遥说。

在部分境外社交平台群组中，“开盒”服务被公开叫卖，根据查询信息的不同，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有时，只需要提供目标的网络ID，就能找出手机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信息。“从信息收集、整合到实施攻击，每个环节都被明码标价。”逄遥告诉记者。

这条产业链上有明确的分工，之所以能精准锁定目标，靠的是“黑库”“白库”“内鬼”的多线配合。

黑库指的是海外“社工库”。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解释，海外“社工库”汇集了大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用户数据。“很多用户为图方便，在不同平台使用相同或相似密码。”何延哲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把所有的门都装了同一把锁。”攻击者利用已泄露的账号密码，在各大平台进行批量登录尝试，即“撞库攻击”，一旦成功，便能窃取更多核心隐私。

而“白库”指的是通过社交媒体等公开渠道搜集到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看似零散，无关紧要，却成了开盒的关键线索。为验证其可能性，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一次信息搜集实验。通过一位网友提供的其本人微博账号，在其过去发布的数百条内容中，轻易地找到了关键线索：一张未关闭位置信息的照片暴露了小区地址，一次为孩子所在小学的点赞，几乎明确了家庭结构，整个过程无需任何黑



视觉中国供图

客技术，仅靠梳理公开信息就能完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零散的信息经过整合后，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年轻一代对网络有天然的依赖和信任，一旦成为流量焦点，所有信息都会在过去的一言一行中被扒出来。”何延哲说。

此外，还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内鬼”。李晓涵补充道：“一些人本职工作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他们希望通过违规售卖用户信息赚外快。”还有一部分人纯粹是以“开盒”为名进行诈骗，利用受害者不敢声张的心理骗取钱财。“我们同事去卧底，结果被骗了35块钱。在这种灰色地带，他们的行为是肆无忌惮的。”李晓涵透露。

治理困境背后的维权难题

“参与‘开盒’的人员总体呈年轻化趋势，相当一部分案件涉及未成年人。”逄遥表示，“开盒”现场最容易发生在文化、娱乐、体育等“饭圈”领域，这些粉丝群体对立情绪强烈，组织化程度高、法律意识淡薄，将“开盒”视为情绪宣泄或“维权”工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过去一年，“开盒”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已有383名网暴者被定罪判刑。尽管相关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但治理仍面临多重挑战。

逄遥说，受害者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已被“开盒”，通常要等到亲友告知才恍然大悟。“那时侵权信息早已在多个平台扩散传播，很难追溯最初源头。”维权时，受



《中国青年说》节目邀请行业专家、律师、平台代表走进北京“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剖析“开盒”行为的黑色产业链及其危害。

受访者供图

害人常陷入“不知道该告谁”的困境。

逄遥举了一个案件为例。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在网络上被人造“黄谣”，由于无法找到谣言的初始发布者，最终选择起诉了一名积极转发评论谣言、粉丝量较大的主播。但该主播抗辩称，他也只是在直播中“吃瓜”，并提供了“谣言”的来源——评论区一张透露女教师隐私的截图。“即便这样一份看似确凿的证据，在诉讼程序司法鉴定中也面临着事实难以认定的难题。”逄遥解释，“打官司打的就

是证据，来源不明的截图，无法确认原始发布者与发布时间，也看不到转发评论等传播数据，属于间接证据，证明效力较低。”

逄遥表示，如何认定“吃瓜群众”转发侵权信息的责任，以及衡量网暴对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同样是目前的一大难点。

在何延哲看来，如何精准区分“开盒”行为与正当的舆论监督，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以之前的‘牵手门’事件为例，从某种角度看当事人确实被‘开盒’了，但其中又掺杂着舆论监督的成分。如果平台简

我背着相机在斯里兰卡做联合国志愿者

陪你慢慢变好

□ 周文倩

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服务联合国机构项目”志愿者，2024年10月，我背着一台相机漂洋过海来到斯里兰卡，提供为期6个月的国际志愿服务。

初次踏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土地，印度洋上的这滴“眼泪”便以38℃的热带季风给了我一个炽热的拥抱。

出发前，我对斯里兰卡的印象还停留在教科书中的“宝石之国”，而现实远比想象生动又复杂。

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是典型的南亚发展中国家，这里的人民热情友好，笑容时常洋溢在脸上。抵达首日，当司机师傅得知我来自中国，特意停车，指着远处那座被誉为“夜明珠”的莲花塔（科伦坡莲花电视塔）热情地说：“看，那是你们中国帮我们建成的美丽莲花塔！”作为中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项目，莲花塔被斯里兰卡政府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象征。

当然，斯里兰卡的生活与中国存在诸多差异。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便捷的电子商务、稳定的水电供应等服务，在这里却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今年2月，一只猴子破坏了一处电站的发电设备，竟导致斯里兰卡全国大范围停电长达5个小时——这并非孤例，电力危机在这里曾多次发生。断电持续至傍晚，身处黑暗与滚滚热浪之中，我切身感受到世界各国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我在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驻斯里兰卡办公室负责宣传与外联工作。另外，还参与为当地争取国际援助，推动就业帮扶、农业

合作等项目工作。

在联合国驻斯里兰卡办公室组织的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中，我和其他国际志愿者一起为当地小学的学生们上“环保课”。在沿街捡垃圾的环节中，我用相机定格了美好的画面——两个小朋友面对镜头笑得灿烂，手中还拎着白色垃圾袋。

我不想对小朋友们说中国是一个多么先进的国家，我更喜欢介绍中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度。

在日常工作中，我逐渐对当地的民生和国际宣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休息时间，我喜欢在斯里兰卡各地走走，亲身体验风土人情。我拿相机记录下了民俗歌舞表演、泰米尔人婚礼现场、新年期间登山的人群、在中国建造的莲花塔下过生日的场景……

在科伦坡的日子里，我有时能眺望到远处中国援建的港口。在印度洋的波涛与绚烂晚霞映衬下，港口中五颜六色的集装箱进进出出。每当这时，一股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为中国参与建设的成果自豪。但紧随其后的，是一种更深的期望：真心希望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建，能越来越好，让这里的人民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现代生活。

斯里兰卡的电子化普及程度远低于我的想象。出门在外，刷卡已是“高级”选项，更多时候只能依赖现金。更让我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电子身份证，所有个人信息依然依靠厚厚的纸质档案记录。

今年2月13日，斯里兰卡政府与联合国驻斯办事处联合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一个登记处（One Registry）倡议，旨在推动民事登记流程数字化、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和系统认知。我有幸在与之相关的全民数字峰会上担任志愿者。会场里，各国企业代表济济一堂。交流环节，我分享了中国在数字化发展方面的经验，尤其是中国乡村电商如何助力农民增收的故事，引起了不

单删除相关内容，很可能受质疑被收买，甚至引发更大的舆情反弹。”

此外，平台间的治理能力差异也给反“开盒”工作带来困难。何延哲透露，其所在的技术小组正在推动建立跨平台协作机制。“单打独斗难以根治问题，需要整个行业形成合力。”

随着具有开盒技术团队的暗语越来越隐晦，识别难度大增。李晓涵所在的团队运用AI技术并辅以人工卧底进行识别，近一年来，处置了超过1200万条“开盒”信息，打击了7000多个违规账号。

给不同的数字身份配“钥匙”

今年8月，何延哲所在的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CCIA）数据安全工作委员会牵头成立了反“开盒”技术工作小组，并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建议：对“数字身份”实行分类管理。

“我们建议用户将数字身份分为不同等级，重要账号如银行账户等使用最私密的主手机号，并开启最高等级的安全保护。娱乐社交账号则使用副号注册。”何延哲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社交平台账户发生争议，攻击者也很难通过那个手机号关联到用户的真实身份。他打了个比方：“这就像现实生活中，你不会用公司的公章去签收快递一样。在网络世界，我们也应该学会给不同的身份分配不同的‘钥匙’。”

“比如在密码找回时设置‘反向提示词’，规则只有自己知道；或者对不重要的网站使用‘弱口令’，意在用垃圾信息污染黑产数据库，增加‘开盒’者筛选成本。”何延哲说。

对于受害者，除了法律维权，心理支持和暂时“隔绝”部分声音也同样重要。李晓涵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每个用户心理强大，但当他们想要拒绝别人评论、关掉一些声音或者不让陌生人看到自己的时候，平台都有相应的功能来实现。”

逄遥建议，网暴发生时，受害者要第一时间固定侵权证据，收集能够显示出侵权内容发布主体、完整的侵权内容，包括发布的文字内容、视频、图片等，能够显示发布时间以及转发、评论等传播数据，作为向警方报案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关键证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已明确指出，组织“人肉搜索”情节严重者，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针对他人实施网络暴力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受害人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还可以拨打12377，这是中央网信办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免费举报电话。”逄遥强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必将被依法惩治。”



□ 蒋继璇

最近，我搬了一次家，不是物理空间维度的搬家，而是在电子空间。

简单来说，我把某社交平台的个人主页分类清空了，将大部分展示内容都“收纳”起来，准备日后再择机“搬回”。

这种因社交需求变化而更换社交平台或账号的方式，被年轻人叫作“电子搬家”。

这次“搬家”的理由并不复杂，主要是为了维持工作形象。我常使用该社交平台用于工作沟通，但是近期有了新的爱好后，总想在主页发帖讨论、展示爱好。

对于我的工作来说，理想的职业形象应该是专业的、理性的、成熟的，而我的新爱好却是松弛的、感性的，甚至是有点幼稚的。起初还不觉着什么，直到有一天，一名同行网友点进我的讨论帖评论道：“原来记者也会玩这个啊。”

那一瞬间，有种隐私被窥破后淡淡的羞耻感。我知道，这个“家”必须得“搬”了！

“搬家”的过程有点复杂，主要集中在“家具”的取舍上，哪些内容可以被展示出来，哪些内容不太适合主页的整体“装潢”，都要根据平台的人设调整。最终，我还是决定将人设让渡给工作需要，继续保持“精装修”后专业知性的风格。至于我那些不务正业的“家具”，只能暂时收起，准备再开个不为人知的小号，“搬迁”到我的“二套房”里。

像我一样在网络上“电子搬家”、反复迁徙的年轻人并不少见。

在微信等熟人社交平台中，很多年轻人需维持符合社会期待的统一人设：作为职场人要专业、作为晚辈要懂事、作为朋友要阳光。而那些单一人设之外的多元自我，则会在不断“搬家”后释放到别处空间：微博小号里的“吐槽大王”、B站评论区的“技术达人”、网易云音乐的“emo诗人”，每一个小房子里，都装着一个不同的自己，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数字人格。

我的“房”并不多，也懒得一一打理。但我的同事小文是电子“房产大亨”，在每一个主流社交平台都至少拥有1个账号；且会根据交友圈层、亲疏远近、社交需求等分门别类，条理清晰。

小文举例：微博平台开放性强，展示空间多，被她用来结识同好网友，但只限网友。如果网友相处久了，信任度增加，就会被她流转至QQ平台——私密性增加，也能了解彼此更多的信息，“证明我可以向你敞开一点了。”小文说。而她“房产链”的顶端，是最为私密的微信平台，里面基本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打交道的熟人。

不得不说，虽然过程有些麻烦，但在小文精心打理后，每一处“电子房产”都简洁明快、称心如意，朋友圈不会因过度交叉而产生问题，她也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去哪里“冲浪”。

不过，只有小文最亲密的好友，才能有权限探访她所有的“房产”，很荣幸，我是其中之一，而我也发现，每一个社交平台上的小文，都有不同的一面，串联起她的爱好、工作、生活。

为什么大家情愿大费周章地“电子搬家”，也不愿在互联网上“全盘托出”？我想，是年轻人在塑造自己的“数字边界感”，理性管理自己的社交成本。传统熟人社会讲究“全面性交往”，而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更推崇“分层次社交”——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面，越熟悉，越深入，但每一层，都有一道边界。

想起第一次询问小文的小红书账号时，我内心有些忐忑：一方面想在该平台上和她成为好友，以便随时分享有趣帖子；另一方面又害怕唐突越界，入侵她可能不想为人所知的空间。正反复掂量我们的关系时，小文主动向我分享了她的账号，我也欣然回应。“主动分享社交账号，像是一种友谊的邀请。”小文说，“是当代年轻人在社交中表现真诚的一种方式。”

此外，选择“搬家”也是在选择不同文化适配度的“数字小窝”。比如，微博是小文固定展示爱好的平台，只要回到那个小窝，她就总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网友。而小红书是她闲暇时刷短视频、了解不同信息的地方，想打破信息差、找找灵感，那里就更适合。这种文化适配性让不同的“数字小窝”真正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家园。

也就是说，大家“搬”的不只是平台，更是对圈层文化的主动奔赴，是用“电子搬家”为自己筑起一块“文化自留地”。比起大平台的热闹，年轻人更在意小圈层的归属感，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邻居都聊你喜欢的话题，在这里，不用伪装，不用迎合，只需做最真实的自己。

『电子搬家』：在社交平台上迁徙的年轻人